



二人都还在从事着跟三星堆关系比较密切的考古发掘和调查工作。

而此次三星堆重启发掘，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于孟洲教授和其他几位老师，带着学生们接过前辈的接力棒，参与了5、6、7号“祭祀坑”的挖掘工作。

于孟洲在接受《新民周刊》采访时表示，此次考古发掘工作还将持续较长一段时间，“5号坑就是出金面罩的地方。而我们现在正在对6号坑进行发掘，因为7号坑的年代要比6号坑早一些，按照考古操作程序的话，要等我们把6号坑做完了，才能开始做7号坑”。

源起何时何处？

三星堆没解决的问题太多了，“就连三星堆文化的一头一尾，从什么时候开始到什么时候结束，现在还没有很准确的说法”。于孟洲说。

2016年，为纪念三星堆遗址1、2号“祭祀坑”发现发掘30周年，一场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三星堆博物馆召开，国内外100多位文博界的专家学者针对三星堆的谜团展开了一场又一场的讨论。

彼时学界对三星堆遗址的分期仍有分歧。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孙华曾提出，三星堆遗址分为三期——第一期期为龙山时代晚期至二里头文化时代初期，第二期期为二里头文化时代晚期至二里岗文化时期（下限可至殷墟第一期前段），第三期期为殷墟文化时期第一期（后段）至第三期。前后跨越了龙山时代、夏代及商代三个时期。陈显丹则提出了“四期说”。而经这次研讨，三星堆考古研究所所长冉宏林又继续对原归为第四期的遗存进行细分，提出了“五期说”。

关于遗址分期的争议始终存在。相关文章指出，其中涉及“成都平原进入文明社会之前的社会面貌、

上图：这是一张拼版图片：左图为1986年，工作人员在三星堆遗址考古发掘现场2号“祭祀坑”内清理文物（考古学家陈德安供图）；右图为今年3月10日，在三星堆遗址考古发掘现场，考古人员在3号“祭祀坑”内工作（新华社记者沈伯韩摄）

族群构成等深层次问题”。直至今日，才基本建立起遗址从新石器时代晚期至西周时期的编年体系和宝墩文化—三星堆文化—十二桥文化的考古学文化发展序列。

“因为对三星堆的发掘工作一直在进行，但相关资料发表得比较慢一些，供研究者研究的材料也相对较少。等之后关于三星堆遗址的综合发掘报告出来之后，应该就能有一个较明确的说法。”于孟洲表示，“至于三星堆的时间跨度，大家说法也不一样，一般笼统地称为夏商时期。”

在霍巍看来，三星堆的魅力就在于“我们过去从未遇到过这样的考古文化，需要用一种全新的‘知识图谱’和知识路径去认识它”。

例如，三星堆1、2号“祭祀坑”相继出土了一些器物，在中原青铜文化中极少见，除了青铜面具，还有大量青铜人像、头像，以及眼睛、神树、神鸟崇拜等。纯金制作的金杖、